

公共政策终结问题研究的回顾与瞻望

范绍庆

(华中师范大学 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启的公共政策终结研究, 掀起过两次高潮, 取得了许多创新性、显著性的成果, 是政策终结理论重大进展的标志。政策终结理论的验证和应用的兴起, 研究议题或主题的拓展, 研究视角或途径的挖掘, 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的凸显, 将成为未来可以预见的重要趋势。而且, 政策终结问题也将逐渐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

关键词: 公共政策终结研究; 缘起; 成果; 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 D63-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533 (2011) 04—0023—07

政策终结是一个颇具诱惑的研究领域。从理论上讲, 自拉斯威尔 1951 年提出政策科学的概念之后, 政策研究或分析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和演进。在政策过程的研究进程中, 研究焦点 50 年代着重于政策形成的问题; 60 至 70 年代着手研究政策执行、议程设定和政策评估; 70 年代中后期开始转向政策终结研究, 研究发展政策终结概念和构建分析框架, 并取得了创新性成果, 成为政策科学重大进展的标志。

一、研究缘起和两次高潮

公共政策终结的研究既是根源于公共政策科学自足性的要求, 也是由社会治理实践的当代特征所决定的。虽然政策终结的研究可以追溯自 20 世纪 50 年代, 但直到 70 年代中期一直未受到重视, 有些学者甚至称其为“政策过程中被忽视的环节”和“未受应有正视的议题”, Jones 更是指出: 我们了解政府如何继续运作, 远远超过我们对如何让政府停下来的理解。^{[1]238}

回顾公共政策终结问题的研究历史, 可以看到, 最早把公共政策终结作为公共政策过程主要环节之一并进行研究的学者是拉斯威尔。然而, 真正的系统研究, 始自巴达克在 1976 年《政策科学》期刊所编辑的政策终结专题。以此为开端, 美国学术界出版了三本论文集, 并由此掀起了公共政策终结研究的两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1976 年, 考夫曼在《政府组织是不朽的吗?》一书中, 从公共组织的视角第一次提出了政策终结研究的一般化理论, 并相继于 1985 年撰写了姊妹篇《时间、机遇和组织: 在逆境中的自然选择》, 对公共组织终结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一时期, 主要针对政策终结的概念发展、影响因素和策略技巧等议题, 从宏观视角对政策终结的历史发展和演进逻辑展开研究, 结合相关案例, 企图探寻政策终结的因果关系, 提炼政策终结的策略方式, 归纳政策终结的一般规律, 为政策终结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次高潮: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至 21 世纪初。1997 年, 两本有关政策终结的综合性著作相继问世, 丹尼尔斯出版的《公共项目终结: 美国政治悖论》以及 Geva-May 和 Wildavsky 出版

收稿日期: 2011—04—21

作者简介: 范绍庆 (1976—), 男, 湖北洪湖人, 华中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后, 讲师。主要研究方向: 公共政策。

的《政策分析的操作性途径：技艺》。这一时期，在前期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和梳理，从微观视角对影响政策终结的因素和执行政策终结的策略进行具体分析，把政策终结作为一个动态过程进行深入研究，采用比较和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进一步验证政策终结的现有理论框架，并试图从新的研究视角或途径，系统化整合政策终结理论，建构新的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

二、主要成果和分析框架

（一）政策终结的发生。

关于政策终结的原因，大致有五种情形：财政需要、政府效率、政治意识形态^{[2]634-635}、行为理论中关于服务提供方式的改变^{[3]6-7}、批判性学习^{[4]136-139}。德利翁对许多终结的经验进行总结，认为这里有三个主要标准或原因导致做出终结的决定：财政需要；政府效率；政治意识形态。尤其强调意识形态的因素，他认为，一些政策终结并没考虑经济需要或效率，主要是基于政治上的意识形态，而这样的意识形态也经常视决策者的态度来决定。此外，德利翁又进一步补充了终结发生的第四种原因，即对于行政、人性或社会服务等行为理论的变化。主要是因为社会变迁所造成不合时宜的现象，由于人们行为的思想观念和观念发生变化，过去为社会所不能或能够接受的，现在可能成为合理或不合理的行为。最后，比勒认为终结的第五种原因是批判性的学习，后工业社会的快速变化和不确定性，导致在决策者有限能力之内，制定适合现状和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并不容易，政策终结为政策决策者提供从决策的错误中重新学习的机会。比勒认为，制定政策开始时，应建立在用最少时间和金钱的实验基础上，这些政策应该根据反馈机制修改和调整。

早期研究者主要着重效率和财政的考量来分析终结的原因，而后逐渐发现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最早是凯麦龙，认为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在终结决策中扮演关键角色，可在理性与感性上说服社会系统朝特定的方向变迁，同时足以让系统中的相关参与者接受并克服先前意识形态造成的惰性，此高度的共识能够提供政策场域足够的能量，赋予政策终结的正当性。^{[5]301-328}德利翁则指出过去二十年政策终结领域研究之所以毫无进展，在于忽视意识形态所形成的立场和态度才是终结决策的根本原因。^{[6]173-199}另一位研究者 Harris 则检验以色列政府在财政拮据和集体农场不能自给自足的状况下，试图终结集体农场的过程。结果发现，意识形态成为政策终结决策的关键因素，而不是成本利益分析为主，验证了德利翁的观点。^{[7]2151-2175}

关于政策终结方式，巴达克认为，“当终结真的发生，通常不是突然的出现，就是经过长时间的消减”^{[8]125}。也就是说，根据终结发生时间长短，将终结方式分为两种：爆发型和长泣型。爆发型即出其不意的发生，是最为普遍的方式，通常由一个权威性决定，其中参与各方经过长期的政治斗争的结果，所以一旦发生时，及时的关键性一击而终结。长泣型即循序渐进的发生，不是由于政策的突然决定，而是使政策既存的资源长期不断流失的结果，Lambright 和 Sapolsky 将此种终结称为“非渐进主义”的方式。对于兼有爆发型和长泣型，认为这种步调温和、有计划的执行终结的方式并不多见。但是，这可能是未来政策终结的主要方式，应该得到重视。

关于政策终结的时机，研究者一直无法解答，考夫曼将政策终结归功于机会和运气，而 Best、Teske 和 Mintrom 认为政策变迁的文献中所使用的二个分析方法可以帮助掌握政策终结的时机，分别是 Sabatier 的倡议联盟架构与 Baumgarner 和 Jones 的断续均衡理论。^{[9]2151-2175}

（二）政策终结的障碍。

关于政策终结的障碍，许多学者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德利翁的政策终结障碍的理论框架，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心理上的不愿意；机构的持续性；动态的保守主义；反终结联盟；法律上的障碍；终结启动的高成本。^{[10]293}

最早对此发表意见的是巴达克，他解释不能终结有五种可能性原因：政策的初始设计、政策终结冲突的残酷、政治家不愿承认过去的错误、不希望破坏现存机构和缺乏有效政治动机。^{[8]123-131} 弗朗兹同样提出，根据德利翁终结模型，认为终结是难以规划和执行，由于诸如心理

不愿意、法律障碍、制度的持续性、动态保守主义、反终结联盟和高启动成本等障碍。^{[11]176}在德利翁和弗朗兹的研究基础上，Kirkpatrick 等人在建构新政策终结的分析理论框架中将限制政策终结的因素归功于五个，即反终结联盟的存在、动态保守主义、启动成本、立法障碍和恐惧或不确定性。^{[12]209-236}而 Harris 把这种限制终结现象归因于意识形态因素。^{[13]323-339}此外，Hogwood 和 Gunn 又加上缺乏政治动力、不利后果以及拖延和拒绝等作为阻碍终结的因素。^{[14]1984}

政策终结的障碍因素意味着终结不易发生的原因，学界在这方面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两个方向，一是朝向考夫曼认为组织的惯性或政策的惰性，这导致虽然它们经历了从出生到成熟，但极少发生死亡，人们都不愿意打破组织本来稳定的状态。二是如同巴达克所认为，相当少的政策是经由明确的政治决定而终结，这是因为决策者少有意图去终结他们过去的决策，此外，政策终结经常代价高昂的，它不仅涉及到法律上和效益成本，而且也必须面临政治和情感上的纠结。因此，Geva-May 在综合大量的分析基础上提出两个主要相关的原因阻止了有关终结的决定，即组织的特性和终结的内在成本（包括政治、情感、经济或法律等成本）。^{[15]263-288}

（三）政策终结的策略。

面对政策终结的六大障碍，研究者极力构建终结的策略以应对，但如何终结，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进行思考，却没有达成共识。德利翁和巴达克是从理念、制度、公共政策目标的角度去思考公共政策终结的策略，而本恩则通过公共政策终结具体案例研究，针对具体公共政策案例分析，总结出 12 项公共政策终结策略，成为研究者普遍用以检验的终结规律，但是也提醒政策终结者应根据政策性质不同采取适当的终结策略。

本恩基于马萨诸塞培训学校成功关闭的经验，提出一套有助于政策终结者进行终结的准则，并概述了终结政策或组织的十二项策略：不要释放试探性信息；扩大政策终结的支持者；聚焦政策的害处；利用意识形态转变；避免妥协；聘用局外人作为终结者；避免立法表决；不要侵犯立法特权；接受短期成本增加；收买受益者；提倡采纳而不是终结；终结仅仅需要的。^{[16]393-413}

巴达克提出了利于政策终结的五项条件，第一，执政者的变动，这导致政治参与者并不受制于过去的决策；第二，反对政策潜在的意识形态；第三，政治混乱时期经常给政治领导者重组的机会；第四，缓解政策终结的影响，例如，在另一个政府项目中安排一项终结项目的雇员继续雇佣，以缓解终结的冲击；第五，设计一项当具体项目目标已经实现时加以终结的政策。

此外，德利翁也提出了终结的策略。他认为，第一，使人们认识到政策终结不是结束而是开始；第二，政策分析家在政策评价阶段上特别注意寻找有效的策略和手段；第三，要充分利用政治行政或主要的人事变动等终结环境的“自然成熟期”。^{[10]1983}

Spirer 以项目管理的观点考察政策终结执行策略。他认为，第一，对政策终结中发生的问题分类，大体分为情绪性和知识性问题，再把前者分为从事者的问题和受益者的问题。第二，处理从事者的问题，如确立新目标、赋予归属感、频繁开会、管理者巡视、合理利用裁减人员等来消除。第三，给受益者提供参与利益。第四，因政策终结产生的各种具体问题，按各个政策的性质从知识问题的观点处理，通过系统分析方法解决，从而使政策终结更有效。^{[17]1983}

此外，Geva-May 也对政策终结执行策略进行了探讨，归纳出三种策略：第一，在终结类型与反终结强度之间寻求平衡；第二，善用情势和特殊社会情境；第三，阐述行动者及动机。^{[18]270-279}同时，Geva-May 又从成本的角度强调政策目标和成本的关系非常密切，要实现政策终结必须处理这些成本问题。

台湾学者林威廷将本恩和 Geva-May 所提策略归类分析，说明终结策略需要考量形势因素。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情境下，终结者需要考虑终结类型是爆发或长泣。因为爆发型终结容易受到终结者策略思考影响，如避免释放风向球、利用意识形态变化、降至妥协、雇佣外部终结者等。此外，政治行动也足以影响到终结过程，如扩大政策参与者、吸纳支持者、收买受益者等。最后

在成本因素的考虑上，决策者应排除增加其经济、法律、政治和情感上的成本，这需要避免立法表决、不要侵犯立法特权、接受短期成本的增加和只终结需要被终结的部分。基于此，将政策终结策略整理为表 1 所示。

表 1. 公共政策终结的策略分析表

在终结类型与反终结强度之间求得平衡	善用情势和特殊社会情境	阐述行动者及其动机	成本
爆发	避免释放风向球; 利用意识形态的变化凸; 政策的危害; 禁止妥协; 聘用局外人来承担终结者。	扩大政策的支持者; 把焦点聚集在政策的危害上; 收买受益者; 倡议采纳。	避免立法表决; 不要侵犯立法的特权; 接受其成本的增加; 只终结需要被终结的部分。
长泣	等待适当的时机		

资料来源：林威廷 《农渔会信用部体制改革之研究——政策终结理论与内容分析方法之应用》，国立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 2004 年硕士论文，第 35－36 页。

结论。丹尼尔斯在《公共项目的终结：美国的政治悖论》中，对政策终结研究进行评价，并作出七个方面的概括：（1）终结很少出于经济理由。终结很少是经济方面的考虑，当终结时在短期内所需成本常常要高于政策继续的成本。所以，德利翁已经观察到终结常常是政治决策而非理性决策分析的结果，经济或效率因素并非终结的主因，而是政治价值与意识形态。（2）终结具有高度政治性的且难成功。美国政治系统具有对通过多种途径影响政府决策的特性，受影响的利益集团，经由政治系统、行政部门、司法以及媒体舆论等渠道，组织动员不同的政策资源阻碍终结的进行。因此，反终结联盟是政策终结的首要障碍，在渐进主义影响下政策终结将难以成功。（3）终结需以诱因吸纳反对者。政策终结者运用策略，吸纳反对势力的成员，取得反对者的支持，以成功阻止或截断反终结联盟参与终结的时机和机会，可见吸纳的策略是成功终结的重要因素之一。（4）终结通常涉及意识形态的转变。德利翁从研究中得出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通常提供终结的基础，并不考虑绩效、成本或经济问题。因此，终结总是随着利益或价值的变动而改变，成功终结常常是政府对于提供服务方式认知上的转变，如社会、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的改变，都能开启政策终结的窗口。（5）终结意味着再生。政策的重生力量巨大，在终结者离开政策场域后，总会从死亡中复活，就算已经终结的政策，并不会走向天堂或地狱，可能是走向新生，这种终结的政策死而复生的现象，屡见不鲜。（6）成功终结难以预知。从考夫曼、德利翁和本恩等人所建构的框架加以评价，其终结成功与否，都是事后研究，至今对于政策终结的预测能力依旧缺乏，而考夫曼将它归功于机会或运气，到目前为止没有发展出一套理论框架来解释，政策终结的时机仍是一个尚未解开的谜。（7）终结是美国政治上的悖论：有多少人支持它，就有多少人反对它。^{[3]69-78}

2. Kirkpatrick S.，Lester J. 和 Peterson M. 的政策终结过程模型。政策终结过程是否可以建构模型，是否可以找出决定终结的因素，早期考夫曼对此持否定看法，认为终结能否成功取决于机会或运气。后来，德利翁、弗朗兹提出政策终结的障碍作为模式建立的开始。而 Kirkpatrick，Lester 和 Peterson 为政策终结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基于对大量研究成果广泛评论上，提出了政策终结过程模型（见表 2）。^{[12]209-236}

Kirkpatrick，Lester 和 Peterson 尝试从个案中归纳出三大概念范畴，即内在特征、政治环境和终结限制，构建出一个描述性的模式。与传统的理论仅就终结障碍或策略单独建立研究架构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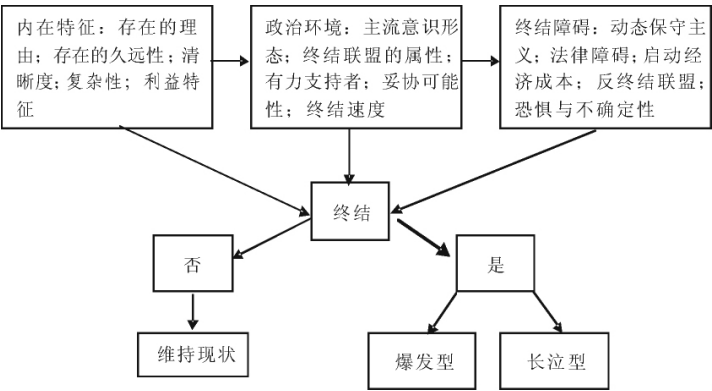
（四）政策终结的理论整合。

通过研究的累积，政策终结领域的学者试图归纳出一般规律、建立起模型，希望能够找出影响终结过程的普遍性因素，为终结者提供参考和经验。目前，较为成熟的有丹尼尔斯对政策终结所下的七项结论，以及 Kirkpatrick S.，Lester J. 和 Peterson M. 所建构的政策终结过程模型。

1. 丹尼尔斯的政策终结

比，模式将终结原因、终结的时间、终结的障碍和策略作进一步的有机整合，是适合解释政策终结过程的描述性模式，为政策终结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表 2. 政策终结过程模型



资料来源：Kirkpatrick，Lester and Peterson，Policy Termination Proces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Application to Revenue Sharing.

构造，不同的因子或变量对终结过程的影响程度，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纳入研究的视野；另一方面对于模型的适用性，对于不同终结对象或情境解释力的质疑，假设的变项都有可能视不同的情况起不同的作用。

三、发展趋势和主要领域

(一) 政策终结的理论内涵。

随着政策终结研究的深入，研究对象逐渐拓展。丹尼尔斯根据不同政策层次，把政策终结的对象分为功能、组织、政策和项目四种。考夫曼独辟蹊径，对公共组织终结进行经典性的研究，以区别于其他政策终结对象研究，而且政策终结不限于公共组织或政府部门，也涉及到非政府组织，像 Norris-Tirrell 便尝试将非政府组织作为研究对象。^{[18]311-322}

在政策终结的研究过程中，政策终结的本质日益明晰。政策终结是动态的互动过程，不仅包括意指的宣布、行动方案的选定以及实际终结活动的执行等一系列行为，而且在政策终结活动中，既有反对者又有倡导者，他们之间的互动策略决定了政策终结的结果，任何外力影响的介入都有可能造成终结路径的改变。由此，政策终结实质上是政策资源重新配置的活动过程。

(二) 政策终结的研究议题。

在政策终结研究领域内，有四个议题尤其值得进一步研究：一是政策终结的伦理问题，二是政策终结的决策问题，三是政策终结的集体行动问题，四是政策终结的评估问题。

本恩早在 1978 年就强调必须注意政策终结的伦理问题，以避免政策终结过程被终结者所操纵，而且 1997 年 Geva-May 和 Wildavsky 第一次在政策终结过程中引入伦理概念，提出政策终结者有对公民和政治系统道德责任的观点，为政策终结的讨论提供了崭新视角。对于政策终结的伦理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研究，一是政策终结的信任，二是政策终结的责任。

关于政策终结的信任，政策终结需要不同行动者的合作，而信任是合作的基石，政策终结并不是单纯的技术或策略问题，也牵涉到政府与人民、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终结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关系。政策终结过程中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之一，就是政府是应该终结政策以适应环境的变化，抑或是信守政策制定时的承诺，坚持既定的政策目标，其中就涉及到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关于政策终结的责任，是政策终结者对于政策终结的决策或执行等行为负责，就公共管理来说，就是指权责与职位的对称配置，依据职位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都是责任的具体体现。在政策终结过程中，如何确保政策终结的进行，可以为公共利益服务，是政策终结者不可逃避的责任，

尤其是掌握政策资源配置权力的决策者。政策终结有风险性，也就是说，政策终结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政策终结后采取的新政策，需要新的资源重新投入，而且在复杂性、不确定的环境中，政策终结也受诸多因素影响，终结一项政策后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新政策效果的不可预见性，选择的新政策并不能保证更好的结果。这的确是棘手的伦理问题。

另一个需要关注的主题是政策终结的决策问题，在政策终结过程中，终结实质上是再决策过程。为此，Frantz 提出了对终结过程具有普遍性解释的具体模式，他认为，政策终结的斗争更应该被认为是政治意愿和技能的斗争，否定了强调效率的决策模式，支持强调人们如何用观念去聚集政治支持和减弱对手支持的政治模式。^{[19]11-28}而且，Elizabeth A. Graddy and Ke Ye 提出了政策终结过程的两阶段决策模式，他认为，两阶段决策模式中的触发事件和决策情景特征两者影响终结决策。^{[20]219-242}然而，政策终结的决策方式、机制和模式仍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再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是政策终结过程中的集体行动，因为政策终结都是集体行动的结果，不同的理论都有不同的争论焦点，如金登的“政策流”概念中就强调政策领导者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以及政策环境或情势将影响集体行动导致政策终结。然而，断续均衡理论的重点在政策企业家上，决策者的行动和策略在集体行动中的关键地位，将可以解释政策为何终结。此外，倡议联盟框架则是关心集体行动的议题，研究倡议联盟信仰体系的变化等，都是从不同角度将有助于政策终结理论与其他政策理论的融合，使政策终结理论拓展和延伸。

还有一个值得讨论的议题是政策终结的评估。政策评估的意义在于衡量政策制定或执行与政策目标之间的差距，并作为政策继续、修正或终结的依据。事实上，不只是原有政策需要评估，终结后的政策同样需要评估，而且政策终结结果的评估更为复杂和困难。

（三）政策终结的研究途径。

从理论建构到建构与验证相结合。从事政策终结的个案研究是一种实证研究，研究途径有两种，一是通过个案研究推演出新的理论，二是通过个案研究验证或检验已有理论，这有助于解释理论、发展理论，甚至是修改理论，也可以用已有理论的观点分析事件发展过程，因此，累积相关终结的个案研究经验，将有利于本土政策终结理论的建构，为政策终结者的实务提供指引。而且，不同的理论模型需要不同的个案来验证，随着时空环境的变化，个案的采纳不仅是时间的跨度或空间的连接，还是研究领域的拓展，不限于公共部门的研究，也可以对非政府组织进行探讨。这样，可以进一步丰富和延展政策终结理论。

从案例分析到比较研究。政策终结的比较研究是较好的终结研究途径，可以累积不同性质或类型的案例，从不同视角来比较，一方面需要了解政策终结理论产生的背景、发展脉络，另一方面不同情境政策终结现象的比较，以及影响因素在不同政策情境的程度、范围和趋向比较。虽然进行比较研究存在诸多困难，如比较的参照物或标准难以确立，也关涉到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的问题，采用不同的比较标准，终结理论或结果可能截然不同。而且，也可能犯简单类比的错误。但是，作为建构本土终结理论的方法，政策终结比较研究仍不失为可以选择的研究途径。

从单一学科到多学科研究。从学科意义看，政策终结研究是跨学科研究，不仅涉及政治学、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等学科，如 Iris Geva-May 运用金登的多源流框架对政策终结现象进行研究，^{[21]309-334}还涉猎到伦理学、生态学、文化学等学科知识，如 Geva-May 和 Wildavsky 试图从伦理视角分析政策终结决策者的道德责任。因此，政策终结的跨学科研究将成为一种趋势。

从国际化到本土化研究。政策终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的个案研究，由于各国历史文化、经济发展和政治架构的差异，各国公共治理方式和形态的不同，各国在公共政策发展上也有不同途径，这使政策终结理论并不能只是一味采用美国模式。由此，政策终结的本土化研究兴起，日本学者佐藤研究了日本麻风病隔离政策的终结，基于先前研究政策终结理论，分析了麻风病政策终结的障碍，并建构了环境、策略和领导的因果框架，以克服政策惰性和障碍。^{[22]29-46}中国台湾

学者 Shu-Hsiang Hsu 陈水扁政府时期台湾核四终结，运用政策变迁的间断平衡模型整合成更为广泛的政策终结框架，研究了台湾核四突然决定终结和探索核四终结议程设定的演进。^{[23] 171-186}

总之，公共政策终结研究不仅是政策过程范式完整性的体现，也是解决政策过程中政策终结问题的需要。尽管政策终结研究已经取得创新性的理论成果，但是，把政策终结作为一个动态的互动过程，建构具有预测性的理论框架，并在不同政策终结的情境中不断检验或验证，仍是未来研究者需要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 Charles O. Jon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Public Policy ,3rd eds. [M]. Monterey ,California: 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 [2] Deleon ,Peter. Policy Evaluation and Program Termination [J]. Policy Studies Review ,2: 4 (1983) .
- [3] Mark R. Daniels. Terminating Public Programs: An American Political Paradox [M].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 ,Inc. ,1997.
- [4] Biller ,Robert P. On Tolerating Policy and Organizational Termination: Some Design Considerations [J]. Journal of Policy Sciences 7: 2 (1976) .
- [5] Cameron ,James M. Ideology and Policy Termination: Restructuring California's Mental Health System [A]. May ,J. V. ,Wildavsky ,A. B. ,Eds. In The Policy Cycle [C]. Sage Publications: Beverly Hills ,CA ,1978.
- [6] Peter Deleon. Policy Termination as a Political Phenomenon [A]. Palaumbo D. ,Ed. In The Politics of Program Evaluation [C]. Beverly Hill ,CA: Sage ,1987.
- [7] Michael Harris. Policy Termination: Uncovering the Ideological Dimens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 12 (1997) .
- [8] Eugene Bardach. Policy Termination as a Political Process [J]. Journal of Policy Sciences 7: 2 (1976) .
- [9] Samuel Best ,Paul Teske ,Michael Mintrom. Terminating the Oldest Living Regulator: the Death of the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 12 (1997) .
- [10] Peter Deleon and Jose Mario Hernandez-Quezada. The Case of the National Solidarity Program In Mexico: a Study In Comparative Policy Terminat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4: 3 (2001) .
- [11] Janet E. Frantz. Reviving and revising a termination model [J]. Policy Sciences 25: 2 (1992) .
- [12] Kirkpatrick ,Lester and Peterson. Policy Termination Proces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Application to Revenue Sharing [J]. Policy Studies Review ,16: 1 (1999) .
- [13] Michael Harris. Policy Termination: The case of Term Limits Im Michiga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4: 3 (2001) .
- [14] Hogwood ,B. W. and Gunn ,L. A. ,Policy Analysis for the Real World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15] Iris Geva-May. When the Motto is 'Till Death Do Us Part': The Conceptualization and the Craft of Termination In the Public Policy Cycl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4: 3 (2001) .
- [16] Robert D. Behn. How to Terminate a Public Policy: A Dozen Hints for the Would-be Terminator [J]. Policy Analysis 4: 3 (1978) .
- [17] Herbert F. Spierer. Phasing Out the Project. In David I. Cleveland & Willa R. King ,eds. [M]. Project Management Handbook ,New York: Van Nostrand ,1983.
- [18] Dorothy Norris-Tirrell. Organization Termination or Evolution: Mergers in the Nonprofit Sector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4: 3 (2001) .
- [19] Janet E. Frantz. Political Resources for Policy Terminators [J]. Policy Studies Journal 30: 1 (2002) .
- [20] Elizabeth A. Graddy and Ke Ye ,When Do We 'Just Say No'? Policy Termination Decisions in Local Hospital Services [J]. The Policy Studies Journal ,36: 2 (2008) .
- [21] Iris Geva-May. Riding the Wave of Opportunity: Termination in Public Policy [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14: 3 (2004) .
- [22] Hajime Sato. Abolition of Leprosy Isolation Policy in Japan: Policy Termination through Leadership [J]. Policy Studies Journal 30: 1 (2002) .
- [23] Shu-Hsiang Hsu. Terminating Taiwan's Fourth Nuclear Power Plant under the Chen Shui-bian Administration [J]. Review of Policy Research 22: 2 (2005) .

责任编辑: 孙永怡